

教育眼

# 治理校外培训需重拳出击

## 补课费成普通家庭最大支出

本报记者 何勇

今年暑假,沈阳的郝女士过得一点也不轻松。她为上初中的儿子报了语文、数学、英语3科课外培训班。每天她都要陪儿子到和平区十三纬路一个老写字楼里补课。

因为现在对在职教师补课查得紧,培训机构便很警惕,每天上课都有工作人员和家长把守,教室的门窗也不敢开。“上课的都是名校老师,虽然补课费、花钱多,但孩子的同学几乎都报了,咱也得补啊,考高中差一分就可能差一档。”一小时100元,这个暑假,郝女士花了两万多元。

这是辽宁一位普通家长的真实状态。前不久,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沈阳、抚顺、本溪、铁岭等4市,采取听市、县政府汇报,分别召开校长与教师、家长、培训机构负责人座谈会,到学校、培训机构实地调研,开展学生、教师、家长问卷调查以及暗访等多种形式,对全省中小学生学习负担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发现,用于子女补课的费用平均每月在2000元以上,补课已成常态。

记者在沈阳调查发现,几十人大课费用至少一小时100元;普通老师一对一补课,每小时要300元;如果“市三所”(当地3所初中名校)老师则更高;初三、高三冲刺阶段,名校教师一对一补课千元一次。而且由于市场需求大、名师少,课外培训往往供不应求。

补课已成为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主要支出。辽阳一位在国企上班的家长告诉记者,从初一开始,基本每年一个人的工资就要全部用到孩子补课。“平时三四百元一次补课,初三就得上千元。别人都补,自己也没有办法,不能给孩子留遗憾。”

有的家长为给孩子补课,不得不在外兼职。记者有一次找代驾,司机有正式工勤编制,夫妻工资不算低。“孩子在普通高中就读。每到放寒假、暑假之前3个月,我都得出来做代驾,一个月代驾差不多有6000元收入,好供孩子上辅导班。”

学校应是教育的主阵地。采访中,家长意见最大的就是,许多校外培训机构以应试教育为目的,“提前教学”“超纲教学”,严重冲击学校的正常教育;更有个别培训机构和一些老师相互依托,抬高补课价格,组织学生进行课外培训。对此,今年沈阳教育部门作出规定,一旦发现中小学校教师在课外补课,调离教课一线3年。

朱先生最近给读二年级的儿子报了国学班。学费一年1.6万元,一次性交清,每周两次课,每次一个半小时。这是朱先生给儿子报的第六个兴趣班。英语班每年1.5万元、跆拳道班每年8000元,再加上足球、口才、钢琴等等,总共差不多8万多元。钱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孩子从周一到周日,只有周日下午可以休息。

在沈阳,初中以前报各种兴趣班,初中后报辅导班,成为一种风气。“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一些家长的自我安慰。记者熟悉的一些家长,不管男孩女孩,一般都要报3个以上的培训班。

也有家长表示,虽然补课费用高昂,但校外培训机构确实弥补了校内教育的不足。尤其是小学阶段,校内的艺术教育明显不足,而校外机构的师资力量、课程研发、沟通服务等相比较而言还是不错的。

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调研还显示,校外培训机构多头管理,整治不力是学生课外负担越来越重的原因之一。虽然三令五申校外培训机构不搞“应试、超标、超前”培训,但绝大多数校外培训机构就是为“应试”而生的,何为“应试、超标、超前”培训,在实践中较难界定。

而且,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由教育、民政、工商部门多头发放,谁是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主体并不清晰,导致监管缺位。

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建议,校外培训机构应由教育部门统一监管。改变多头监管的局面,明确教育部门为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主体,相关部门配合日常监管,对违规培训一经发现立即吊销办学许可。

加强学校课后服务,是治理课外补课乱象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小学生和初中学生在校时间有明确规定,课后服务的时间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应在自愿的前提下坚持“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建议明确规定课后服务费用由参加者承担。

利用科技手段,推进网络资源共享,通过“名师云课堂”等方式,让优质教育资源发挥更大作用,也为治理校外培训提供了方案。可以鼓励教师制作“微课”,让学生能够随时通过观看老师的微课来解决学习中的问题。

## 『我好想睡个大懒觉』

本报记者 付文

方晓萱的中秋节假期,有两天半没有休息:两天上数学、作文和英语辅导班,半天在学钢琴。而国庆节假期,也已被辅导班“霸占”了4天。

“我的假期,不是在补课,就是在补课的路上。”方晓萱嘟囔着向记者诉苦。11岁的她今年刚上五年级,因为上半年生了一场病,成绩有些落后。章女士和丈夫在兰州市城关区做服装批发生意,每天忙得团团转。“我们就想着把这个娃培养好。”章女士说,从今年暑假开始,两口子一口气给晓萱报了3个辅导班。

“现在小孩子的数学作业,加减乘除我还能解答,但有的图表、图形作业我都不会,根本没法辅导。”章女士告诉记者,一个月下来,3个班得5000块钱。“只要孩子将来有出息,钱花再多也值了!”但这3个班老师的水平到底怎么样,章女士心里也没底。

晓萱上课的地方,在兰州市城关区雁滩路与雁西路路口附近。记者粗略看了一下,在这个路口周边500米范围内,分布着十四五家培训机构,其中涉及文化课培训的就有五六家。记者随机走进其中一家,向前台人员咨询“辅导老师有没有教师资格证、是不是学校在任教师”等问题,但其以“经理不在、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回答。

“大部分同学都报了校外辅导班,主要是数学和英语。”晓萱说,她所在的班级有一半多的同学在上辅导班。“孩子性格内向,遇到不会的题目不敢在课堂上举手问,课间老师也不会围着题目个人转。”章女士说,在现在的辅导班上,老师只教4个学生,相比之下,有的问题比学校老师讲得更透彻,晓萱也能听得懂。

“我好想睡个大懒觉,自然醒的那种。”晓萱说。“晓萱每天做作业都到10点多,我也知道她很累,可是其他成绩好的孩子都报了班,我要是不给她报,那差距不就越来越大了吗?”章女士冲着记者无奈地摊了摊手。

附近一位环卫工大姐也告诉记者,每到周末,她都能看到不少孩子成群结队地上辅导班。“你看看那些孩子,哪一个不是来的时候还打瞌睡,迷迷糊糊的?”

有的家长想给孩子“补短板”,而更多的家长是为了“培优”,这更加剧了部分家长和学生的不安和焦虑。“我儿子今年初三,明年就要参加中考了。现在成绩稳定在班里前5名,但他自己提出要报理化班。”在一家培训机构外,冯先生在和和其他家长交流,“反正他有兴趣学,我就给他花钱报班。再说现在打好基础,说不定对将来高考也有帮助。”

听闻此言,不少家长流露出羡慕的表情。“你说人家的孩子咋就那么聪明、懂事呢?”章女士喃喃自语。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兰州市教育局联合民政、人社、工商部门下发了《关于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要求各责任部门对无证无照培训机构,指导其依法依规办理证照;对不符合办理证照条件的,责令其停止办学,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同时,坚决查处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讲”或诱导、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

日前,甘肃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工商局四部门也决定自9月25日到10月15日,加大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力度,对武威、张掖、兰州、白银、平凉、庆阳、陇南、临夏8个市州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重点督查。此次督查将采取明察暗访形式进行,目的是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督查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规范中小学招生管理、教学管理和教师管理。

2016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要遵循青少年成长特点和规律,扎实做好基础的文章。基础教育要树立强烈的人才观,大力推进素质教育,鼓励学校办出特色,鼓励教师教出风格。遵照习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关于国家社会组织办学的规定,中国红十字总会事业发展中心坚持公益导向,面向地区实际,积极开展办学助学实践,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和社会的肯定。

## 构建公益办学的新方式

国家一直提倡和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办学助学事项,而社会组织公益性、群众性很强,在办学方面能够有效调动和运用社会资源,对基础教育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能够适应不同地区出现的教育多样化需求,开展富有特色的基础教育教学,形成新的良性教学运行机制。

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1998年事业发展中心创办了扬州世明双语学校,设有幼儿园、小学部、初中部、艺术培训中心,在校生1600余人。2003年,创办了北京拔萃双语学校,设有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国际部,在校生2400余人。两所学校建设费用均来源于社会定向捐赠,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由事业发展中心面向社会公开选聘,同时兼任学校法人和理事会理事长。理事会确定学校发展战略和目标,进行重大事项决策。两校分别成立监事会,对学校日常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学校严格按照国家《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的规定,将学校总收入60%用于学校人工成本,20%左右用于运营、维修,20%左右纳入学校事业发展基金,用于学校自身再发展。

这种办学模式,充分体现了学校的公益性质,形成了顺畅的管理体制和充满活力的办学机制,保证了学校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当地获得了广泛赞誉。经过长期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公益办学有利于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各界的真诚奉献,有利于促进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

## 健全保障教学质量的新机制

保证并提高教学质量是国家对民办学校的严格要求。我们体会到,基础教育核心在打基础,关键在抓质量,保障在建机制。这是公益组织办学,办好事的几个重要环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指导学校始终围绕素质教育这个主题,坚持立德树人,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首位并贯穿教学全过程。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确定了“聘招结合,新老结合,内外结合”的选人用人原则。在扬州世明双语学校、北京拔萃双语学校,招聘了一些熟悉教学业务、富有管理经验、教育理念先进的退休资深校长,分别担任学校校长和各学部的负责人,聘用了一批业务精、能力强、敬业爱岗,具有高级职称的知名退休骨干教师,分别担任主科把关教师。在办学过程中,又邀请了著名大学的专家组来校测试,招聘一批优秀高校毕业生,作为后备力量加以培养,从而形成了以老带新、融合提高的良好机制。学校实行日常考核与学期末考核制度,并定期引进校外第三方考核,全面推行岗位工作目标责任制,以保证教学质量目标的实现。

在学生学习上,摒弃流行多年的不当做法,让学生在一个均等、开放、共享的环境中学习。摒弃那种设置重点班、快慢班的做法,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随机编班进行学习;摒弃那种大班满堂灌教学的做法,对学生按规定编小班进行教学;摒弃那种由校外补习班加强弱科的做法,坚持因材施教和个别化教学,尽可能在校内予以满足。学校规定要专门关注后1/4学生学业,加强针对性、个性化辅导。这样就能让学生们学有比较,学有兴趣,学有上进心。

由于有了这样的保障机制和内生动力,教学质量能够得到不断提高。扬州世明双语学校荣获扬州市素质教育先进学校、艺术教育特色学校等称号,北京拔萃双语学校荣获朝阳区中考优秀校、北京市优秀民办学校等称号,这既肯定了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又给了学校健康稳定发展的动力。

## 拓展公益组织的新特色

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社会组织办学必须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必须形成自己的优势品牌,这样才能在教育领域站稳脚跟,才能赢得社会及家长们的真诚欢迎。我们在办学过程中,始终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并将这一精神有机地融入教学活动和实践活动,使红十字精神在幼小的心灵中深深扎根,在家庭和社会上得到传扬。

在确保正常学习的情况下,开展丰富多彩的红十字教育活动。为了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责任感,学校各个学部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服务活动,定期组织学生走访特教学校聋哑生,慰问福利院的孤儿及老人。在每年“5·8”红十字日,学校组织学生进行红十字精神宣传展览,开展红十字知识竞赛等活动。学校还成立红十字志愿者协会,开展各种活动,培养学生的博爱之心和关爱之心。在安全教育上,学校坚持对学生进行自救互救能力水平的培养,使“急救为人人”的思想深入人心。

公益办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公益”二字,这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宗旨。多年来,扬州世明双语学校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免除了400多万元学费,为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发放了数千万元的奖学金。北京拔萃双语学校实施资助困难家庭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助学计划。截至2017年,两校已经资助2200多人次,资助金额近1500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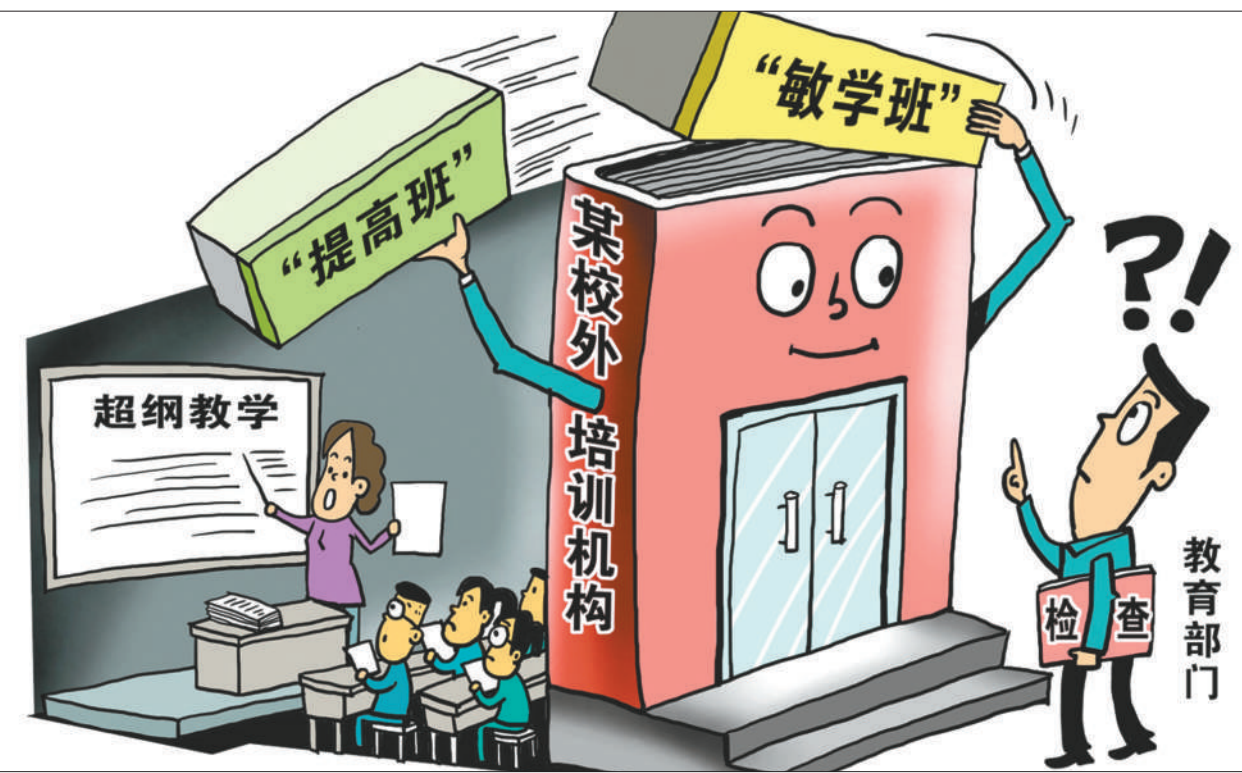
从2013年开始,事业发展中心动员社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先后设立红十字文化发展基金等3种基金和若干专项基金。多年来,我们运用这些基金共培训了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南、贵州等地的90位小学校长;在江苏、安徽、湖南、青海、甘肃和云南等省捐建了“拔萃公益小学”,资助、奖励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及优秀教师共6600多名,基金支出已有4000多万元,进一步彰显了红十字会办学办学的公益特色。

社会组织办学,是我们开始的初步尝试。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开拓了新的路径。在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征程上,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协同各方力量,努力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 社会组织公益办学的实践与思考

江丹



“超纲”“拔高”改换名目,防暗访“假关门”应对检查……校外培训机构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 前沿访谈

# 保障每个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

——访中国残联第七届主席团副主席程凯

本报记者 丁雅诵

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进程中不落下一个困难群体,让每个残疾人都有机会改变自身命运、成就人生梦想,办好特殊教育意义重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殊教育取得长足发展。截至2016年,视力、听力和心智智力3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就已达到90%以上;2017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107所,专任教师5.6万人;2012年至2017年间,累计有5.15万名残疾人被普通高校录取。

日前,记者就特殊教育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残联第七届主席团副主席程凯。

记者: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殊教育事业越来越多地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广泛关心。特殊教育的进步体现在哪些方面?

程凯:从政策层面上看,《残疾人教育条例》修订颁布,《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先后实施,《关于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出台,《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印发,与特殊教育相关的政策出台密度为新中国成立成立以来最高。

从条件保障上看,中央财政特教专项补助经费从2013年的5500万元提高到2014年后的每年4.1亿元。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从2000元提高到6000元以上。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已基本实现从义务教育到高中阶段教育的12年免费教育。

从师资队伍建设上看,特教教师培养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师范类院校普遍开设特殊教育课程,60多所本专科高校也开设了特殊教育专业。“国培计划”累计培训了6350多名特教骨干教师和650名特教学校校长。目前特教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68%,比5年前提高了12个百分点。

记者:从总体上看,特殊教育仍然是教育事业的短板。当前特殊教育还面临哪些挑战?

程凯:特殊教育总体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仍是制约特殊教育的主要问题。

一方面,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及水平仍有待提高。因为没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儿童大部分不属于传统特教对象,其中82%为重度残疾,82%生活在农村,近七成生活在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非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还不能满足需求。接收残疾儿童的幼儿园数量不足,融合教育质量不高;特教普通高中数量较少、布局不够合理;保障残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相关支持还没完全到位。

此外,特教学校专任教师和相关专业服务人员,比如物理治疗、语言治疗、心理康复等人员的缺口还比较大。特教教师的总体待遇与他们承担的社会分工、劳动的

复杂程度和实际心智体力投入相比,还是偏低。

记者:面对特殊教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今后将从哪些方面努力,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办好特殊教育”的要求?

程凯:以普及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为重点,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个残疾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首先是做好数据共享,依托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动态更新大数据,摸清残疾儿童少年底数,通过“一人一案”解决适龄残疾儿童的入学问题,做好控辍保学工作。

其次是结合脱贫攻坚,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修订《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创造性发展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多种形式开展残疾青壮年文盲扫盲工作,让更多残疾人通过学习文化技能自食其力。

再次是维护残疾学生高等教育权益。一方面继续为残疾学生参加各类国家教育考试所需合理便利提供支持和指导;一方面协调有关部门,在规划布局全国高等特教学院、规范单招单招等方面出台具体办法。

最后是按照《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15—2020年)》,以特教学校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为重点,做好推广工作。